

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思想维度

——概念史研究的视角*

周 桂 银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许多政策，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内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指南。这些政策形成的一些概念既是观念的，又是实践的。在概念史的维度上，当代中国对外政策概念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关切，它们在生成和变迁过程中，经历了特定的政治—社会语境和传播渠道，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效应。概念史研究有助于增强中国外交史考察的思想深度。

〔关键词〕当代中国；外交史；思想史；概念史；研究议程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2)-03-0109-15

Thought Dimen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History

Zhou Guiyi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ulated a lot of ideas, concepts, judgements, assertions and slogans in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us created guides, principles and roadmaps for handling the CPC's and the country's foreign affairs. All these terms ar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hes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oncepts were born within different temporal circumstances, aiming at various policy concerns, spreading with various contexts and by various channels, and finally resulting in different political-social effect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ethod of conceptual history would contribute to thought depth in the explor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过许多用来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的观念与概念，它们或成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对外政策纲领和根本原则，如“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或作为一个时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如“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或成为特定形势下中国对外政策及基本立场，如“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不结盟”。还有一些论断、提法或口号，如“东风压倒西风”“三和一少”“和平崛起”，是在特定形势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或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对外关系论述和建议，曾引起重大对外政策争论，并影响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走向。近年来，这些观念、概念、论断、提法和口号，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政策、战略及立场，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学者对上述当代外交史概念及其体现的政策与战略，如“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时代背景、政策实践与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而详尽的考察，并试图归纳和总结当代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规律^①。二是国际政治学者对一个特定时期的概念或某些特定概念的内涵、功能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启示，如“中间地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意义，进行理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中国公民保护与救助机制研究”（20AGJ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孙建社、石斌：《从“中间地带”到“世界多极化”：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人民出版社，2003年；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1—18页。

论上的解读^①。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从概念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概念进行梳理，进而提出一项关于中国外交史讨论的概念史研究议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概念史旨在探讨重要概念的内涵及变迁、概念生成和变迁的环境、概念传播的途径与方式^②。就本文所讨论的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而言，概念史研究还涉及相关概念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效应，尤其在政策指向和政策实践上的功能和效应。本文探讨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第一，这些概念是在何种背景下形成或提出的，具有怎样的意图或指向？第二，在理论上，这些概念是否可以分类，其内涵的稳定性和变化性如何，在实践上又呈现出哪些外在特征？第三，它们的内涵为什么稳定，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它们的含义及变化，与特定环境、载体或传播渠道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其政治及社会功能又如何？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在概念史研究视角上勾勒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思想维度。

一、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生成和演进

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共十八大作为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将当代中国外交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外交政策上可称为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相辅相成的时期；第二个时期（1978年至2012年）处于改革开放时代，在外交上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第三个时期（2012年以来）是新时代，在外交上可概括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积极有为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时期及相应的特定阶段，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外交研究界均提出若干重要概念，用来界定国际形势、归纳外交原则、规划外交政策、指导外交实践。这里以相关概念产生的形势背景及政策指向作为线索，讨论这三个时期中国外交史的观念基础、政策基调和实践风格。

表1 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历史分期

阶段	特征	主要概念
1949年至1978年	独立自主、和平共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东风压倒西风，三和一少，世界革命中心，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两个中间地带； 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
1978年至2012年	和平发展、有所作为	第三世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结盟，和平与发展，国际新秩序；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和平发展合作，多极化，战略伙伴关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机遇期，伙伴关系，和谐世界，睦邻、安邻、富邻。
2012年以来	大国外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大变局。

（一）独立自主、和平共处（1949年至1978年）

在第一个时期，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是两条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主线，但在不同阶段，中国领导人对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又各有侧重，因而产生了具有阶段性印记的外交概念。这个时期大体

① 王鸣野：《“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科学出版社，2017年；周桂银：《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Zeng Jinghan (2020). *Slogan Politics: Understand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oncept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② 关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一项新近论述，参见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三联书店，2020年。

上可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 50 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出发，接受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现实，以巩固国家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方针（又称“三大外交决策”），其中，前两项旨在摒弃旧中国丧权辱国的旧外交，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后一项是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①。根据“一边倒”外交方针，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工协作的口头协议，由中国领导和支持东亚地区被压迫民族革命事业，而新中国也相继承承担起支持朝鲜和越南等地的民族解放战争或革命运动，事实上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亚洲革命中心”^②。所以，从新中国成立伊始，革命外交就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

另一方面，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立场。从 1953 年底到 1956 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概念，用来处理中国与周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如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是新中国睦邻外交的缘起。不久，中国领导人开始探索中国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包括英国、法国、瑞典、荷兰等。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和 1955 年亚非会议上，中国还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于处理复杂的多边外交问题。1956 年 10 月，中国正式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③。为指导新形势下的和平外交，中国外交最高决策层在坚持两大阵营理论的基础上，部分地回到毛泽东在 1946 年提出的“中间地带”概念，其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与美国有矛盾的西欧国家和日本，建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④。

第二个阶段始于 1956 年苏共二十大，止于 60 年代末中苏边界冲突。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及同年波匈事件前后，中苏两党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认为西方阵营困难和矛盾很大，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东方阵营的转折点，因此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⑤。以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为标志，中国领导人确立了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方面坚持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另一方面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要大力支持世界革命，包括声援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支持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⑥。中国外交由此走向激进化，革命外交压倒和平外交，“亚洲革命中心”逐渐发展为“世界革命中心”。

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破裂走向冲突，毛泽东愈益认定苏联修正主义是一个外部大敌，并由此将“反帝反修”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任务。这种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被称为“两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68—1482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2—3 页。

② 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 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 年，第 121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63—196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175—181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 卷，第 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93—1194 页；《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32—343 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58—162、205—207 页；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 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⑤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21—335 页。同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相应的重要论断：“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52 页；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学林出版社，2012 年，第 16—17 页。

个拳头打人”“两面开弓”或“反两霸”^①。为达成“反帝反修”的外交总任务，毛泽东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理论支撑：一是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后，批判“三和一少”外交路线^②。毛泽东将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与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决心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自此在外交政策上愈益走向激进化^③。二是不断发展他的“中间地带”理论，在1963年和1964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即亚非拉是“第一中间地带”，而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属于“第二中间地带”^④。据此，中国在外交上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即直接同盟军，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即间接同盟军，建立一个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⑤。

第三个阶段从6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两个拳头打人”“世界革命中心”和“两个中间地带”基础上的外交战略，在总体上恶化了中国外交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为改善不利的甚至危险的周边及国际环境，中国领导人着手调整对外政策，将苏联视为主要威胁，转而改善中美关系，即“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⑥。毛泽东和周恩来毅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致力于联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力量，建立一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形象地将此称为“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即北半球纬度上的、从东到西的一条横线，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一大片”，是指“第三世界”^⑦。但为了维护中国“世界革命中心”的国际形象，毛泽东在“中间地带”概念基础上，又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美苏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是第二世界，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美苏两霸，但在当时特定形势下，主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⑧“三个世界”理论仍然遵循国际阶级斗争及国际统一战线的思路，但它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回归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和平发展、有所作为（1978年至2012年）

在第二个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明确主线。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旗帜，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史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止于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形成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重要战略判断，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中国外交政策作出重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6页；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200页；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27页；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4辑，第6页。

② 王力：《王力反思录》（上），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188—191页；《王力反思录》（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928—932页；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第17—21页；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91、504页。

③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53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5—489、506—509页；《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3—346页。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6—7页；牛军：《“第二中间地带”：1955—1965年的中国对西欧国家政策研究》，《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第134—154、221页；李丹慧：《分册引类：中国分化苏联东欧集团再探讨（1964—1965）》，《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57—63页。

⑥ 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0—442页。

⑦ 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68—470、517—51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⑧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7—588、600—601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7—8页。

⑨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5、508页。

大调整^①。一是以1982年中共十二大为标志，中国改变了过去的“一条线”战略，回归并重新解释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公开宣布“不结盟”，即不与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是世界一极，中国不打大国牌，也不允许其他大国打中国牌^②。二是坚持中国的第三世界身份，即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大国，但在经济上是一个小国穷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反对霸权主义，中国绝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中国不仅坚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双边关系、周边外交，还提倡根据这些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③。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西方国家实施对华制裁前后，邓小平又提出“不当头”“不扛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以下称“八字方针”）的指导方针。“不当头”是80年代“不称霸”思想的发展，即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当头，永远不扩张，永远不称霸^④。“不扛旗”是从中苏大论战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出发，提出在党际交往和国家间关系上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扛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大旗^⑤。“八字方针”是“二十八字方针”^⑥的简称，是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发生剧变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导方针，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战略考虑。一是在国际形势判断上，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坚持自己的利益和原则，做好自己的事情。二是在方针政策上，坚持“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不要成为国际政治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不当头、不扩张、不称霸，保持自己的主动权；在国际事务上要“少露锋芒”，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强加于人。三是在近远期外交目标上，坚持“有所作为”，要推进多极化、建立国际新秩序，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工作，争取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⑦。

第二个阶段从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六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系新格局^⑧。一是将邓小平的“二十八字方针”，发展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并提出“绝不当头”和“有所作为”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前者意味着“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后者则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要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利益，旗帜鲜明地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⑨。二是将美国作为中国“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提出处理中美关系的“十六字方针”^⑩。中美关系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5—417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106、126—129页；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57页；宦国英、宦国瑞等：《宦乡往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第253页；王珂、樊超：《关于1982年夏季中国外交决策会议的考证——兼论当代外交研究的史料与方法》，《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7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283—29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97、281—283页；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11—1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417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365页；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20—62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365页。

⑥ “二十八字方针”，全称“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是中央外事部门及研究机构根据邓小平的几次讲话和谈话总结而来的。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5—321页；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第5卷，第584—586、607—608、630、645页；高屹：《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述论》，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2—51页。

⑧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322页。

⑨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6、352页。

⑩ 中国领导人在90年代初期主动提出处理中美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1—317页；钟之成：《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上的“十六字方针”与总体外交工作的“十六字方针”构成一体两面，而这两项方针的根本宗旨，在于抓住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为中国发展在世纪之交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在运筹中美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形成“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这是80年代“不结盟”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四是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指明了新时期睦邻友好外交的方向^①。

第三个阶段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共十八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遵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形成了中国处于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继续奉行“八字方针”战略，正式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②。一是中国在2005年和2011年两次正式发布对外政策白皮书，向全世界明确宣示和承诺，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根本国家战略^③。二是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提出“和谐世界”设想，即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④。三是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新方针，“睦邻”意指和睦相处、共筑地区稳定和谐，“安邻”是指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促进共同安全，“富邻”强调深化互利合作、推进地区一体化、实现共同发展，这就充实和发展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⑤。

（三）大国外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2012年以来）

在第三个时期，中国坚持继续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鉴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为理论指南，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推进外交工作^⑥，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第一，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为指南，进一步优化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其根本目标是以大国身份、大国倡议和大国意志推进中国对外关系，进一步完善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伟大事业^⑦。一是提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诸大国之间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局面，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⑧。二是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指针，将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睦邻外交思想^⑨。三是以“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加强和创新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13—318、567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91、95页；《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6—441页；杨洁篪：《伟大的创新 丰硕的成果——十年来我国外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求是》2012年第20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

④ 《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350—356、503—519、612—658页。

⑤ 温家宝：《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在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的演讲》（2003年10月7日），《人民日报》2003年10月8日；石源华：《新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1949—2019）》，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50—51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6—299页。国内外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普遍将2012年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风格概括为“积极有为”或“奋发有为”。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1—444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6—429页；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79—281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47页；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96—299页。

南南合作机制，推动中国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①。

第二，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指引，通过中国话语、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一是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其重点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共同建设六大经济走廊，以促进中国与相关地区的互联互通、相融相近、共同发展、共同进步^②。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探索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等国间的双边命运共同体^③。三是致力于在全球开放合作、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在地区及全球安全、气候变化、海洋、极地、太空、网络等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中国积极提出一系列具有包容性的、可操作的行动方案或倡议，体现了中国责任和中国担当^④。

第三，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战略判断。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⑤。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即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的程度更加深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中流砥柱，深刻地参与、引领和塑造全球及地区事务。“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⑥从时代、历史、世界的视角看待“百年大变局”，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上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⑦，其根本宗旨是维护、延长和创造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分类和特征

上述三个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概念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时期，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对外关系表现为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第二个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下，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线；第三个时期，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及特定阶段，中国外交政策概念都形成了一个从外交观念到外交实践的完整逻辑链条。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这个逻辑链条细分为由不同层次观念、概念和行动构成的多个环节，从而对它们作出分类，并归纳其基本特征^⑧。

（一）性质与类型

在外交战略及决策理论的意义，从外交决策诸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看，当代中国外交政策观念与实践之间的逻辑链条，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战略判断、身份定位、理论指南、方针和原则、外交布局及政策实践五个环节或五个层次。就此而言，以上所讨论的概念可以归纳为五大类型。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56—46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87—291、292—295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06—517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90—494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21—526、537—549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33—475页。

⑤ 习近平：《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创繁荣美好世界——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2019年6月7日），《人民日报》2019年6月8日。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28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7页。

⑧ 章百家将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政策观念归纳为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稳定和影响深远的观念，如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关于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策略设计的观念，包括战争与革命、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参见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4辑，第9页。

表 2 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类型

战略判断	身份定位	理论指南	外交政策原则	外交布局
战争与革命	社会主义阵营 亚洲革命中心 世界革命中心	两大阵营 中间地带 三个世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睦邻外交，世界革命、三和一少	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
和平与发展 战略机遇期	第三世界 发展中大国 世界一极	世界多极化 国际新秩序 和谐世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平发展合作，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不结盟、不扛旗、不当头，战略伙伴、伙伴关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百年大变局	世界大国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积极有为	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一是战略判断，这是关于时代性质、主题、国际大势或潮流的基本判断，决定着特定时期或阶段的根本外交立场、方针和政策。如第一个时期“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直接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国家身份定位和根本外交政策方向，即“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亚洲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中心”，以及相应的“革命外交”和“一边倒”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时期也是如此，中国领导人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形成了中国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认为中国能够而且也应该抓住机遇，迎接和化解挑战，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基本战略判断之下，在特定阶段可能会形成关于国际形势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阶段性判断，对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作出估计，如 1957 年“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

二是身份定位，这是关于中国自身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客观或主观界定，国家身份定位客观还是主观，或是否出现偏差或错位，决定了外交政策指南是否正确、外交政策方针能否贯彻、外交总体布局是否合理。在第一个时期，中国领导人从国际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及革命主义的爱国主义出发，将中国定位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亚洲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中心”，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对中国外交政策作出阶段性的安排与调整，先后形成“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的外交布局。从第二个时期到第三个时期，中国的身份定位从发展中大国变成“世界大国”，或者说，从“世界一极”变成国际政治上“极其重要的一极”，相应地，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南和总体外交布局也发生变化。“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则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和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长期目标。

三是理论指南，是关于时代、历史和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总体陈述，如“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国际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它们一方面对国际政治的规律和趋势、中国与世界关系作出理论说明，另一方面规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总任务和总布局。如果说基本战略判断和国家身份定位是决定性的，那么理论指南则是枢纽性的和桥梁性的；在外交观念转化为外交政策与实践的过程中，它们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动员和转化作用。第一个时期的“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第二个时期的“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新秩序”，第三个时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指南、舆论塑造、政治动员和组织实施上，都是极其重要的理论框架。

四是外交政策方针和原则，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的策略、方式和方法。第一个时期的“和平外交”“革命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第三个时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八字方针”“积极有为”，都是这样的方针和原则，它们构成了特定时期或阶段的中国对外关系的主线和基调。如在第一个时期，“革命外交”是两大阵营对峙背景下中国对外关系的题中之义，它从国际阶级矛盾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致力于推动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和进步^①。与此同时，从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出发，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适时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做法，打开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大门^②。

五是外交总体布局和外交实践领域的一些概念，规定了中国外交工作的大方向或基本立场，提出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同领域的路线图或工作指南。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应于不同的对外关系领域，中国领导人都提出了相应的原则、方案、方式或方法。例如，在第二、第三个时期，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下，对不同方面有着相应的工作指南或路线图：在大国关系上，有“不结盟”“战略伙伴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在周边外交上，有“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和“亲诚惠容”；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上，有“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在多边外交上，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二）基本特征

概括地说，在以上外交政策概念中，绝大多数都有着思想指南和大众政治的特质，因而有着纵向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以上五类概念中均有着这样的特性，但尤其彰显在战略判断、身份定位和外交政策原则三类概念上。相当一部分概念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形势的产物，因而呈现出时代性和演进性，主要包括理论指南和外交布局两大类概念。少数则具有阶段性和争论性，主要是形势判断、政治及学术争论上的概念。

第一，稳定性和继承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长期坚持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立场，而在对外政策实践上又保持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战略判断、身份定位、理论指南上，中国领导人虽然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从“社会主义阵营”到“第三世界”和“世界大国”、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到“国际新秩序”的转变，但在和平外交政策上，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线始终未变，“独立自主”立场和“有所作为”态度始终未变；在周边外交和第三世界外交上，“睦邻”和“国际新秩序”的政策方针也始终未变。在第二和第三个时期，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地位的不断变化，中国赋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更丰富的内涵，“不结盟”“不当头”“不扛旗”“不称霸”“有所作为”成为题中之义；在理论指南上，从“国际新秩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长期目标；在外交总体布局上，大国关系、周边外交、第三世界外交、多边外交以及相应的原则立场与政策措施，也是前后一贯的^③。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体力行和不懈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际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时代性和演进性。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概念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形势的产物，还有一部分概念是中国领导人对前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概念、观念和理论作出新的解释，用来指导新时期新阶段的外交工作。这主要表现在理论指南和外交布局两大类概念上。例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多次对“中间地带”作出新的解释，以指导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外交工作。如1946年8月，毛泽东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概念，用来指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广阔地带，其主旨在于尽可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际和平力量，帮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④。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1482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57页。

^② 参见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唐家璇：《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胜利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工作回顾》，《求是》1998年第20期；刘华秋：《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伟大贡献》，《光明日报》2004年8月17日；杨洁篪：《伟大的创新 丰硕的成果——十年来我国外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求是》2012年第20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1194页。

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时，大体上是指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地区，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中国与周边及其他地区的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从1957年莫斯科会议到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间地带”发展到包括美苏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即将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东欧国家纳入其中，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势力”“两个第三世界”的提法，一个是亚非拉，一个主要是西欧和东欧，在政策指向上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立足于“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形成一个反对美苏两霸的广泛国际统一战线。在60年代末中苏边界冲突以前，以反美为主、反苏为次；在此之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主要目标，甚至为此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构想，即联合美国、西欧、日本等第一、第二世界的国家，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①。

1973年，毛泽东最终接受第三世界的特定内涵，即“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界定，而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或身份定位^②。1974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三个世界”的思想，明确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要倚重和团结的力量，其他国家是中国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③。在理论前提和政策指向上，“三个世界”继承了“中间地带”，即基于敌友我的国际政治主要力量和基本矛盾的判断，建立起一个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更为重要的是，“三个世界”理论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身份定位问题，即从“社会主义阵营”到“第三世界”的转换；二是开始超越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从国家间关系出发去看待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从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角度去筹划和实施外交战略，逐渐摆脱世界革命指导思想的束缚，在外交实践上逐渐放弃“革命外交”。

第三，阶段性和争论性。阶段性概念用来概括特定阶段的国际形势，或界定国际基本力量及主要矛盾，或指称特定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它们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争论。其中，一些概念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得需要调整，如“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另一些概念如“东风压倒西风”“革命外交”“世界革命中心”，被实践证明在主观上存在较大偏差。这些概念均已成为历史，然而，它们是特定阶段和特定形势的产物，对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工作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对中国外交造成重大挫折；但在事后及长期看，个别概念不乏积极作用，如“革命外交”不仅在特定时期或阶段对于新中国打开外交关系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还至少留下两大外交遗产：一是树立起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敢于斗争、不怕邪、不怕鬼的国际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中举世公认的、重要的独立力量；二是中国同情和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和革命事业，获得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成为推动国际和平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的重要力量。

还有一些概念，经过争论和讨论而得到扬弃或发展，如“三个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曾分别出现过两次关于“三个世界”或“第三世界”的讨论。经过第一次讨论，中央领导人决定以后只采用“第三世界”提法，放弃“三个世界”划分；在第二次讨论后，“第三世界”继续得到沿用，中国决定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工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④。

① 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牛军：《“第二中间地带”：1955—1965年的中国对西欧国家政策研究》，《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李丹慧：《分册引类：中国分化苏联东欧集团再探讨（1964—1965）》，《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2辑；罗时平：《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2期。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③ 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章百家：《1974：向1946回归》，《世界知识》2006年第17期。

④ 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角》，《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4辑，第11页；李琮：《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三、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传播、功能和效应

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概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由于传播渠道的多种多样，内涵往往会出现变化。而对于不同类型的概念，中国领导人所期待的政治社会功能及效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又不完全一致。一般地说，绝大多数的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都是中央高层政治决策的产物，因而有着专业主义外交话语的特质；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许多概念又呈现浓厚的大众政治色彩。在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生成和演进的三个历史时期内，专业主义和大众政治两种特质是共生共存的，甚至是相互转换的；但在不同时期，这两种特质的面相和分量又表现各异：第一个时期有着明显的大众政治色彩，革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基调、政治动员的风格是这些概念的基本特质；第二个时期经历了从大众政治向专业外交的转变，务实主义是基调，专业主义是发展方向；第三个时期大体上是专业外交与大众政治的融合，兼具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分，大众政治维度上的对内对外政治动员是基本风格。专业主义和大众政治的两种不同特质，其共生共存、相互转换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上的内涵变化与表现，体现了这些概念的基本功能和效用。这里以几个概念的内涵变化为例，展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传播渠道、政治社会功能和效用。

（一）传播渠道

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传播，主要有三大渠道或三个层次。一是官方渠道，即通过党和政府领导人、外交官、地方官员进行传播。中共政治动员与组织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于对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进行政治动员，以达成全党全国的理论共识和思想团结。如“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在各个阶段的提出与传播，都首先在党内高层之间进行解释、说明、陈述，然后向外交官和地方官员作出指示、进行动员，从而在日常外交工作上得到贯彻执行^①。二是专家学者渠道，即通过海内外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研究人员进行传播。专家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概念作出理论和学术意义上的诠释与传播，发挥双向的舆论塑造作用：一方面对于一些外交政策概念进行广泛的讨论、清晰而明确的界定、系统的理论阐述，对于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起到积极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或讨论中，对普通民众起到一定的引导、教育和宣传，从而实现社会意义上的舆论动员和支持。三是大众渠道，即中国党政机构对人民群众的动员，以及民众在接受和运用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政治行动对于党和政府外交工作形成一种反作用力或反向塑造，如第一个时期的“世界革命外交”，一方面开启了中国外交的激进化历程，另一方面在社会大众得到动员后，部分激进分子通过实际的政治及外交行动，对当时的中国外交工作形成反作用^②。

在以上三个不同层次的渠道传播过程中，相关外交政策概念的内涵会出现变化。概念传播的不同渠道上的人员，由于时间先后、层级差异和经历不同，对于同一个概念内涵及功能和效用的理解、接受和传播，往往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时，要严格区分和慎重对待三类不同的载体。一是党和政府官员层次的载体，包括：（1）中央及地方两级的党和政府档案文件；（2）已公开的党和政府文件、报告、声明、照会、谈话；（3）当事人的回忆录、年谱、官方传记、日记、信件；（4）口述史。二是专家学者或学者型官员层次的载体，主要有：（1）中央及地方两级的代表性舆论阵地（报刊）的文章及评论；（2）内参及咨询报告、小册子；（3）专业期刊及通讯；（4）当事人的传记、日记和信件；（5）口述史。三是大众层次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1）小册子；（2）当事人的传记、日记和信件；（3）口述资料。

在传播相关概念的过程中，不同层次的载体不仅会导致概念内涵发生变化，还会产生不同政治

^① 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11页。

及社会效应。例如，在第二个时期，“八字方针”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但在不同的传播渠道上，不同的受众或对象对这项方针的内涵及地位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完整的“二十八字方针”，是邓小平对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和对外关系的未来方向的思考，但先后经过若干阶段和多次讨论才形成的。首先，在冷战结束、东欧剧变以及西方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实施对华制裁之际，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其核心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一心一意谋发展^①。在苏联解体之后，针对党内有人提出要扛起社会主义阵营大旗的想法，以及在此前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呼吁中国带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说法，邓小平形成了“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思想，即“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但又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②。1991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时指出，在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1992年南方谈话后，针对中国国力发展及未来国际地位，他又提出中国要经过若干年的“韬光养晦”，争取成为国际上的“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的说法^③。

在政学两界有一个颇为流行的“二十字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1995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二十字方针”，用来概括邓小平关于国际形势剧变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思考，并指出这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十字方针”不久即流传开来，得到海内外政学两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二十八字方针”和“二十字方针”进一步概括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并多次在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会议上系统阐述其内涵，说明其作为全党全国外事工作和相关领域战略筹划的思想指南的重要地位^④。

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将“二十字方针”高度浓缩为“八字方针”，并在多次重要会议上系统论述“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关系，即一方面要避免成为国际斗争的矛盾和焦点，减少中国发展面临的压力和阻力，不要锋芒毕露，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另一方面要积极妥善地运用我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但是在“捧杀”和“高帽子”面前不上当，一切对外工作和相关战略谋划都要以服务于国内建设、维护中国核心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要务，对其他利益要有所取舍、灵活对待^⑤。

“八字方针”作为邓小平的一项外交遗产和中国奉行的一项重大战略，在21世纪初期得到全国党政干部的认同和接受^⑥。但是，在专家学者和普通大众两个层次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它理解为一项权宜之计，自然地，这项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一些欧美国家的政学两界人士理解或解读为中国的一项谋略^⑦。所以，在不同层次、不同对象那里，“八字方针”的内涵和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二）政治—社会的功能和效应

在关于外交政策概念功能的研究中，相关文献较多从外交决策理论出发，关注政治心理学意义上的信号表达。理论上，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国家提出一项或多项外交政策概念，有着或明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363页；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第5卷，第600—622页；《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236、242页；《阎明复回忆录》（2），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21页。

③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第5卷，第630、644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02页；《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26、352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503—519页；《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234—246、436—441页。

⑥ 杨成绪：《邓小平外交思想浅议》，《光明日报》2004年8月9日；刘华秋：《邓小平外交思想永放光华》，《求是》2014年第16期。

⑦ 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暗、或近或远的意图，可能是为了显示身份，可能是为了表达利益诉求，也可能是向外表达一种态度或立场，包括诚意、安抚、施压、褒贬^①。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成立的，但大都忽视或未能充分讨论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关联性，也就是说，特定外交政策概念的提出、传播及实践，离不开特定时期或阶段的国内政治因素，尤其外交决策机制、最高外交决策者的关切，包括他们的内外政策诉求、政策风格、个性特质。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生成和演进的内外外交互动的背景，提出了国内政治动员与对外宣传效应的政策目标，前一个方面包括塑造政治忠诚、凝聚思想共识，后一个方面主要是对外宣传^②。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进而形成一个大致的分析框架：专业主义特质的外交政策概念为何会成为大众政治话语？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外交决策者目的何在？从专业主义转向大众政治，概念的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后，这些概念所造就的政治及社会效用，对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政治逻辑，有着怎样的含义？或者，就中国外交政策概念史研究而言，是否应该拥有一种中国特色或中国路径？

第一，如上文所述，外交政策概念本质上是专业主义的，但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许多概念都已成为大众政治话语。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国内建设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舆论动员、宣传和组织方面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同样体现在外交政策舆论及外交工作实践当中。作为动员舆论、凝聚共识、团结全党全国的重要手段，许多外交政策概念由最高决策层提出后，以文件下达或宣讲教育的形式，到达一定层级和范围的干部；在必要情况下，还会开展全党全国范围的宣传教育活动，以至相关概念由专业政治词汇转变成大众政治话语，如“一边倒”“反帝反修”“八字方针”“一带一路”。此外，不同时期领导人的群众路线倾向、基层工作经历经验以及个性风格，也极大地推动了相关概念的大众政治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间地带”“东风压倒西风”“三个世界”，改革开放时期的“不当头”“不扛旗”，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体现了特定时期不同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和领导风格。在这些不同的倾向和风格背后，一方面表现出特定形势下的政策指向或政治目标，另一方面又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动员舆论和统一思想的方式。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最高外交决策层提出的“三大外交决策”概念迅速成为大众政治话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需要实施多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事业，因而需要动员大量的国内资源，包括人力、物质和精神资源，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让广大干部群众接受这些概念。因此，50年代对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大规模援助，以及六七十年代对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援助，包括多项无私的重点援助对象，如越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③

第二，与上述国内舆论动员所密切联系的，是这些概念的国际政治效应，即通过对外宣传，展示中国形象，彰显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在使用不同的外交政策概念的过程中，对于专业主义与大众政治各有侧重，在不同时期也是各有特点的。例如，“东风压倒西风”“世界革命中心”“三个世界”等概念，是毛泽东向国内外政治听众反复论说的几个概念，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提到“中间地带”“和平共处”，试图找到安全与革命之间的平衡点。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同时又不断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新秩序”，就是向世界上的不同听众宣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立场，展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和世界一极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在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任期内，中国对外宣传大体上做到了内外有

^① 蒲晓宇：《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常晓燕：《施压信号、安抚信号与中美战略互动》，《战略决策研究》2021年第3期。

^② Zeng Jinghan (2020), *Slogan Politics*, pp.21-39；周桂银：《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与特征》，《国际展望》2021年第1期。

^③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349页。

别，对内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对外宣示“和平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全世界展现当今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上的远大抱负。

第三，国内国际政治因素互动中的“国内政治第一”逻辑，即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服务于国内政治，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三个时期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方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以及外交工作服务于国内建设大局的方针；但在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双双提升，中国未来战略走向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关于“和平崛起”的讨论。“和平崛起”的提法出现在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建议下，中国领导人在2003年底公开使用这个概念^①。在理论和实践上，“和平崛起”蕴含了以和平手段而崛起、为着和平而崛起、崛起后的和平道路等多种维度，此后，经过中央外交决策部门和相关各界的讨论，到2005年11月时，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白皮书和领导人出访演讲中，郑重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到2006年8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和平发展”成为指导全党全国对外工作的思想指南^②。自此，“和平发展”“和平发展道路”取代“和平崛起”“和平崛起道路”，成为中国的根本国家战略^③。

另一方面，在特定阶段，内政与外交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干扰，造成中共政治动员（党内中高级干部的动员和普通干部的动员）与一般社会动员（广大群众的政治动员或党外人士的社会动员）之间的界线，以及国内政治宣传与对外宣传之间的界线模糊。例如，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形成的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与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影响的纠缠状态。在国际政治形势与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相互影响下，毛泽东作出了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国内外修正主义斗争的决断，由此导致外交工作激进化。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中央先后几次在高级会议上有组织地批判“三和一少”修正主义外交路线^④。“三和一少”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内涵、功能及政治—社会效应，提供了一幅较全面的国内政治与外交工作相互影响的画面：在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上，需要找到一条用“三和一少”命名的“坏”路线，使其成为党内干部和党外群众看得见的批判靶子。批判“三和一少”，从内外两个方面动员了全党全国干部，实现了塑造舆论、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的政治目标，即全心全意、多快好省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以上说明，在国内外形势剧变的情况下，国内政治外交化与外交工作政治化互为表里，而相关的外交政策概念或口号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政治—社会效应。国内政治外交化必然通过专业主义概念转变为大众政治话语的渠道，而外交工作政治化又是大众政治的必然结果，并反过来作用于国内政治。

概念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路径，旨在考察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揭示特定词语的语境及联想。在国际国内思想史研究领域，概念史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从概念史研究的视

① 《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141页；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2003年12月10日），https://news.ifeng.com/special/wenzong/waijiaofengcai/200703/0301__764__81517.shtml；郑必坚：《中共十六大和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在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讲演》（2002年12月9日），郑必坚：《思考的历程——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根据、内涵和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25—130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380—384、435—443、503—519页。

③ 郑必坚：《思考的历程——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根据、内涵和前景》，第2页；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角》，《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4辑，第11页。

④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4—460页；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491、494页；《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276—277、298页；《王力反思录》（上），第188—191页；《王力反思录》（下），第928—932页。

野出发进行的梳理和讨论，仅仅是概略性的，只是提供了一种不成熟的路线图；更加科学合理的研究，需要我们对每一个概念进行梳理，对所有可能的文献进行挖掘，进而在理论上作出分析和归纳，推出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概念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所归纳和讨论的每一个概念，以及上述的相关维度，都值得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究。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未公开的档案文件和有限的学术平台，但在基本方法和研究议程上，国内外现有的一些概念史研究框架和文献可资借鉴^①。

当代中国外交史概念产生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和思想智慧，同时还来源于丰富的中国思想及文化传统和普遍的国际事务与对外关系实践的启示。就此而言，对当代中国外交史概念的研究，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在纵横两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方面在传承的基础上致力于创新，准确地发掘、丰富和扬弃古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外交思想与文化遗存，进而实现外交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实现理论的实践价值，即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外交史概念的政治及思想智慧，尤其是若干创造性的概念或理论，往往来自于长期的甚至漫长的对外关系实践或艰难的政策实施过程，而它们只有回到外交实践中，为大国外交工作服务，才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院讲座教授）
（责任编辑 薛 承）

① 概念史研究相关文献，参见 Richter Melvin (1986). Conceptual History (Begriffsgeschich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14 (4), pp.604—637; Richter, Melvin (1987). Begriffsgeschicht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 (2), pp.247—263; 梅尔文·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孙江、黄兴涛等：《概念史研究笔谈》，《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上接第108页）向西发展，担负起党将来开发河南，以完成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成一片的历史任务。”^①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再次溃败，刘少奇、陈毅在6月提出向西发展中原的战略任务，“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发展河南的斗争任务是必须完成的”^②。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共同开发河南，控制中原，其中第4师受命“西进豫皖苏边，首先恢复肖、永、夏、宿抗日根据地，然后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黄河以东地区”。8月15日，彭雪枫等率第4师主力誓师西征，于20日越过津浦路，次日首战，击败国民党军王传授部。^③ 但9月11日，在夏邑县八里庄与国民党军李光明部的作战中，彭雪枫不幸牺牲，张爱萍调任师长。经过四个多月的作战，第4师控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止商亳公路、北自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地区，最终基本上恢复了原豫皖苏根据地^④。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师资博士后）
（责任编辑 吴志军）

① 邓子恢：《关于四师三年来在豫皖苏边区斗争总结（节录）》（1941年7月），《豫皖苏根据地》（一），第136—137页。
② 《刘少奇、陈毅关于第四、第五师准备向河南敌后发展致张云逸等电》（1944年6月23日），《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303页。
③ 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第54、55页。
④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第215页。